



創于1897

NO. GUYINXUE YANJIU TONGLUN

# 传统古音学研究通论

黄易青 王宁 曹述敬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传统古音学研究通论

黄易青 王宁 曹述敬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古音学研究通论 / 黄易青, 王宁, 曹述敬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567-4

I. ①传… II. ①黄… ②王… ③曹… III. ①汉语—  
上古音—研究 IV. ①H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868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  
传统古音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7JHQ0001)  
最终成果之一

传统古音学研究通论

黄易青 王宁 曹述敬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567-4

---

2015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2 1/2

定价: 98.00元

# 目 录

绪论 传统上古音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	1
序编 传统古音学的基础:今音学和等韵学 .....	22
第一章 今音学 .....	24
第一节 《切韵》系韵书的发展及研究概况 .....	24
第二节 《切韵》音系 .....	55
第二章 等韵学 .....	89
第一节 等韵图对语音结构和系统的分析 .....	89
第二节 门法 .....	113
第三节 早期等韵学 .....	126
上编 传统古音研究 .....	137
第三章 古音学的孕育与发端 .....	139
第一节 汉魏以来对古音的认识 .....	141
第二节 宋元明的古音学 .....	146
第四章 古韵部框架的建立和臻密 .....	174
第一节 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的古音学 .....	174
第二节 戴震、孔广森、严可均的古音学 .....	210
第三节 王念孙、江有诰、张惠言的古音学 .....	238
第四节 姚文田、刘逢禄、朱骏声等人的古音学 .....	262
第五节 清人对古音研究的总结 .....	279
第六节 章太炎、黄侃、钱玄同、王力的古音学 .....	291

第五章 古韵研究专门课题·····	326
第一节 入声·····	326
第二节 阴阳对转·····	351
第三节 旁转、通转·····	359
第四节 本音、变音·····	376
第六章 古声母研究·····	392
第一节 古声纽相转规律的探讨·····	392
第二节 古声纽的分析与归并·····	398
第三节 古声纽系统的构建·····	415
第七章 古四声研究·····	427
第一节 从顾炎武到黄侃的古四声研究·····	427
第二节 古四声研究的材料及其分析方法与处理程序·····	450
中编 材料论·····	469
第八章 研究上古音的材料及其运用·····	471
第一节 先秦韵文·····	472
第二节 谐声材料·····	491
第三节 《切韵》·····	497
第四节 传世文献中的语言文字材料·····	517
第五节 训诂中的音韵学材料·····	552
第六节 方言材料·····	571
下编 方法论·····	577
第九章 传统古音研究方法论·····	579
第一节 时地音变互动观及时地音变综合考察法·····	580
第二节 归纳法与演绎法·····	589
第三节 结构分析法与系统观·····	601
第四节 概率统计法与渐变观·····	615

第五节 上古音研究中的以义正音法·····	628
第六节 清儒古音研究中考古与审音二者的相互推动·····	647
主要参考文献·····	664
致谢·····	672

# 绪论 传统上古音研究的观念和方法<sup>①</sup>

古代的上古音研究，是传统“小学”的一个部分，最早是从释读经典文献的实用目的出发而发展起来的。它的研究材料主要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语言文字中存留的语音现象和古代的韵书。它的主要方法，一言以蔽之，是形音义互求。这种研究从汉代开始，在宋代有了较大的推进，到清代达到一个高峰。二十世纪以来的汉语音韵研究，因为方法的更新、材料的扩大、工具的改进，比清代传统古音研究有了很大进步。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被中国语言学吸收后，历史语音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了一个新路子，对传统上古音研究有补充，也有推动。人文科学随时代发展，总要有继承在内，上古音研究属于继承成分很大的学术领域。其实，研究汉语的上古音，不论谁来做，不论用什么方法来做，都要以传统音韵学已有的成就为基础，而在方法上，也无法脱离传统方法的主要精神和已经建立的操作程序。学术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但有了一条新的路子，就去否定传统，似乎有点“过河拆桥”，显然不是一种正确的科学态度，更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新的学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传统本身也在寻找新的形式。传统上古音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究竟有哪些特点，哪些精神是值得今天甚至永远要吸取的，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总结和阐发的一个课题。

## 一、以追求解释力为研究的重要目标

早期传统古音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是为解释经典文献服务，具体

---

<sup>①</sup> 本文最初发表在《汉藏语学报》第2期，题目是“谈传统上古音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作者：王宁。现作为本书的绪论。

说,它是为训诂服务的。承认这点并不贬低它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人文科学是以认识自己为终极目的的,六经皆史,为解释文献典籍服务,就是为史料服务,也就是为还原自己的历史服务。人文科学同样是追求真理的,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就是要符合语言文字的客观实际。

(一) 上古音研究首先要服务于对文献字、词及其意义进行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做到对文献思想内容的还原。

现代科学发展后,传统“小学”这个“附庸于经学”的特点,曾经被不少人否定过,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起点,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的话,这应当是一个最好的起点。汉语音韵研究一切好的品质,正是这个从语言文字实际出发又为解释语言文字服务的起点带来的。

“小学”为解读古代文献服务,清代著名的乾嘉学者戴震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他的著名的比喻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异轿中人也。”<sup>①</sup>“六书”就是汉字造字的方法,轿中人就是经典中的道,语言文字是抬“道”的轿夫,也就是负载思想的工具。他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sup>②</sup>

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古代的小学,小学是为大学“学以致其道”打基础的,学道超越小学,就会蹈空。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音韵学解释文献、还原文献思想内容的功能。清人戴震曾举例说,是汉代人提出了“古音”的概念,他说:

古音之说,虽近日始明,然郑康成氏笺《毛诗》云:“古声填、寘、尘同。”及注他经,言“古者声某某同”“古读某为某”之类,不一而足,是

① 段玉裁:《戴东原文集序》,《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2页。

② 戴震:《古经解诂沉序》,《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46页。



古音之说，汉儒明知之，非后人创议也。<sup>①</sup>

《邶风·东山》一章：“蝻蝻者蝻，烝在桑野。”传：“烝，寘也。”笺：“蝻蝻蝻然特行，久处桑野，有似劳苦者。古者声寘、填、尘同也。”毛传说“烝在桑野”当读作“寘在桑野”，郑笺说“寘在桑野”是“尘在桑野”。因为“寘、填”与“尘”古音同，“尘”通“陈”，都有故旧即陈旧义（《释诂下》：“尘，久也。”），“尘在桑野”就是久在桑野的意思。又《小雅·常棣》四章：“每有良朋，烝也无戎。”笺：“古声填、寘、尘同。”又：“常棣之华，鄂不韡韡。”笺：“不当作拊。拊，鄂足也。……古声不、拊同。”在这里，郑玄明确提出“古声某与某同”的论断，目的就是通过古音关系来解决古代文献的用字问题，从而解释文献的意义，正确阐发古书的思想。

（二）从解释具体意义提高到解释语言文字中反映的语音现象，从一些与今音不同的情况中看到材料的时代、地域差异。

语音随时代而变，后人阅读古代韵文感到不协，更加从音韵方面产生了解古音的需要，进一步促进古音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六朝、隋唐的“协句”“协韵”说，实际上接触到了语音演变、古今音异的问题。罗常培先生说：沈重等人的“所谓‘协句’、‘协韵’，与他家所谓‘取韵’、‘合韵’等，皆指古音而言，此唐以前人已知古今音异之证”。<sup>②</sup>按照当时的读音，很多古代韵文无法押韵了，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才有了“协句”“协韵”之说。如，《召南·何彼褻矣》一章：“何彼褻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华”与“车”为韵，《释文》：“车，协韵尺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读华为敷，与居为韵。”陆德明说“车”字“协韵尺奢反”，“或云古读华为敷”，不管是读“车”为尺奢反，来与麻韵的“华”协，还是读“华”为敷，来与鱼韵的“车”（音居）协，猜测古音的读法，就是为了解释以今音读《诗》感到不押韵的现象。通过这种解释，六朝、隋唐发展了汉代关于古今音异的思想。

音韵学与文字学、训诂学的明确分界，始于魏晋时代，到有清一代的乾嘉时期，音韵学不但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且有了自己独特

① 戴震：《书〈广韵〉四江后》，《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84页。又见《声韵考·古音》，《戴震全集》第五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第2278页。此《毛诗》笺见《常棣》诗。

② 罗常培：《周秦古音研究述略》，《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1页。

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但是,上古音的研究仍然是在追求解释力的目的下发展的。“方音”“合韵”概念的提出,增加了新的解释角度。

顾炎武从《诗经》与《周易》《楚辞》的用韵差异出发,提出先秦有方音。他在《易音》中说:

真淳臻不与耕清青相通,然古人于耕清青韵中字,往往读入真淳臻韵者,当繇方音之不同,未可以为据也。《诗》三百五篇并无此音,孔子传《易》,于《屯》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于《观》曰:“观国之光,尚宾也;观我生,观民也;观其生,志未平也。”是“平、正”皆从“民”字读矣。于《革》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至屈、宋亦多此音,《离骚》以“名”从“均”读,《卜居》以“耕、名、生、清、楹”从“身”读,《九辩》以“清、平、声、鸣、征、成”从“人”读,而秦汉之书亦时有之。……今吴人读耕清青皆作真音。以此知五方之音,虽圣人不能改者。

他认为:《诗经》时代中原地区耕、真是不同的韵部;孔子齐鲁方言以及《楚辞》代表的楚方言中耕、真常有合韵,这种合韵正是方音的表现。

江永进一步提出,不只是《骚》《易》用韵与《诗》韵有方音的不同,就是《诗经》中也有方音。他在《古韵标准》“平声第一部总论”中说:

《诗》中亦有从方音借韵者,东冬钟既借侵,亦可借蒸,皆转东冬钟以就侵蒸,非转侵蒸以就东冬钟也。要之,此皆方音偶借,不可为常。

读音和押韵违背了常态,是时代变化和地域差异的反映。站在统一、规范的角度衡量“方音偶借”,就是一种“合韵”。规律之外,还有新的规律,不论是用古今音变,还是用方言分歧来解释“合韵”现象,都使我们一步步接近了上古汉语语音的事实。音韵学的解释力,在这里更好地显示了出来。

(三)对字词语音关系的解释,也就是对汉字构形系统、词源系统的解释,是古韵学解释力的进一步拓展。

“古音”概念的最初提出就是缘于对上古汉语事实解释的需要,古音研究的发展就是缘于对众多上古汉语事实的综合、全面解释。古代汉语

语言文字材料是古音学的土壤,对语言文字现象的解释是古音学发展的动力,从这块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古音学,是为了解释汉语语言文字现象,也只有从汉语语言文字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古音学,才能真正解释这些现象。人们以往往往说,清代古音学的发达推进了训诂学和文字学的发展,殊不知清代音韵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以训诂和文字材料来推进的。正是古音学和语言文字解释之间的这种互动和辩证关系,成就了乾嘉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高峰。乾嘉学者哪一个不是从解释上古语音现象的宗旨出发来发展自己的音韵体系的?戴震的九类二十五部与《转语》、王念孙的古韵二十一部与《广雅疏证》、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与《说文解字注》,都是以语言文字材料进行古音研究,又以自己的古音体系解释汉语古代文献和汉字中存在的语音现象的。

语音相同相近的关系除去偶然的情况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词语渊源上的联系。从汉语同源词的两两系联,到成群的局部系联,再到网络状的词族系联,人们一直在探讨汉语词汇之间在不同阶段的渊源关系。这种探讨,使音韵学的解释语言现象的目标从文献解释的目的,提升为语源学的目的。

词源关系的探讨一开始就以语音为线索,所以,上古语音关系是词源研究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最初的词源关系研究是零星的,因为,在古音学还没得到很好发展的时代,是不可能有条件进行较为全面、较大规模的词源关系研究的。到了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时代,古音体系的框架基本构成,就有可能进行较系统的词源关系研究。他们把自己建立的古音体系,首先施之于文字训诂学中的音近义通现象。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成而后注《说文》,王念孙用他的古韵二十一部疏证《广雅》,都是以当时古音学的最高成就解释古代文献中的音义关系,达到因声求义的顶峰。

在戴、段、二王的训诂学之后,章太炎要开拓的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源系统研究。词源系统的研究需要一个古音系统的支持。在王念孙、江有诰的古音二十二部基础上,章太炎从“脂”部中立一“队”部,成为二十三部,并创制了《成均图》。上古文献和字书中表现出词的同源关系,不是同一时、地的产物,用一个统一的音系去解释,语音关系会很纷繁,因

此,清人开始用“转”的概念来描写各部类之间的多元关系。这些各种各样的“转”如何从现代语音学的音理上解释?它们之间是散乱的还是互有关系?章太炎综合清代古音学体系对各部之间关系的安排意见,使韵类的多重的复杂关系统一于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之中,解释了上古汉语同族词的孳乳与变异。

王力的《同源字典》弁以《同源字论》,其中的《韵表》和《纽表》就是解释同源词语音关系的标准。跟章太炎一样,除了声、韵的部类划分,他还建立了声、韵的系统,据以确定对转、旁转、通转、准双声、旁纽、邻纽等语音的远近亲疏。这些都是为了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的复杂的语音关系,来解释复杂的词族关系。

古音研究的这种追求对语言事实的解释力的传统,是值得我们继承的。古音研究如果不能解释古代文献中反映的各个层面的语音事实,它的科学性是很难得到证实的,方法再“现代化”,也难以论定其价值。

## 二、遵循“内证为主”的基本原则

从清代就发展起来的考据学,到了二十世纪,由微观的个体考证发展为宏观的系统考辨。这种考辨必须经过“发疑—取证—推论”的过程才能得出结论,而结论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证据的可信程度。上古音的研究在取证上一直遵循“内证为主”的基本原则。

与论证的主体同时代、同类别的事实证据,就是“内证”,这些材料是保留在古代文献和韵书中的。音韵学的内证材料包括:

(一) 古代韵文。谁都知道,科学意义上的上古音韵部的研究是从《诗经》韵脚的系联开始的,但韵文材料在反映上古音韵部关系上数量不足。首先,先秦十三经不重复的单字将近 6000 个,至于魏晋,《昭明文选》的用字将近万字,而《诗经》入韵字只有 1850 个<sup>①</sup>,据此不能确定其他几

<sup>①</sup> 王力《诗经韵读》中的《〈诗经〉入韵字音表》涉及 1850 个单字。该《表》中区别了一字二词而音不同的情况。统计时这种情况计为二字。

千个字的音读。其次,有些入韵字出现的次数少,与之押韵的字也少。例如,在《诗经》中,“包、诱”只在《召南·野有死麕》一章中各出现一次,除二字相押外,不再与第三个字押韵;“条、聊”二字,各出现两次,但两次都仅仅是这两字相押(《唐风·椒聊》一、二章);……遇到此类情况,系联必然中断。所以,必须补充其他韵文材料,《易经》《尚书》《左传》《楚辞》《老子》《管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的部分韵文,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诗经》韵脚的不足。

(二) 汉字的谐声偏旁。汉字的谐声偏旁弥补了韵文材料的不足。吴棫的《韵补》已经注意到利用谐声考求古音,顾炎武大量考证谐声材料,段玉裁提出“同声必同部”,作出了规律性的总结。钱大昕在古声母考求上也利用谐声,如“古读馮为憑,本从冰得声”<sup>①</sup>,凭字之声符相同而推定其必同韵部、同声母。以谐声推断字的古音,如“麟”字归部的推定,大前提是如下的语音定律:造字时所取声符的韵跟谐声字的韵必定相同;小前提是如下的事实:“麟”与“粼”同从“粼”声;结论是:“麟”与“粼”同部。(《唐风·扬之水》二章“粼、命、人”为韵,在真部。)清代研究上古音的学者,没有不采用谐声来推导、证明古音的。不过,必须明确,谐声时代“声符”相同,却不能直接拿来作研究上古声母的材料,需要经过甄别和整理:第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所以同一个声符在先秦两汉的不同的时地可能代表着变化了的不同音值;第二,汉字不是标音文字,汉字的声符是起区别作用的,只是与所谐字近似;第三,声母中同部位的字或同为鼻音的字(明泥疑来等)听起来音感相近,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凭借耳力严格分辨的;第四,汉字在一个很小的两维空间构形,早期的非形声字,时常可以记录不止一个词,是为同形字,所以它在作声符时也常常代表不同的音;第五,较晚时期的形声字,有时是早期古文字中多体象形字的理据重构,并非原初的形声字。这些复杂的现象如不认真分析,就会产生对语音现象的错误解释。

(三) 古代文献的字用材料。研究上古音的语音规律,首先要考虑

<sup>①</sup>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上海:上海书店,1983,第110页。

声、韵的类别与声类、韵类的配合关系。上古声母方面的一些主要的语音定律,如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娘日归泥、照二归精、照三归端、喻三归匣、喻四归定、古无邪纽等,很多是通过古代文献中的字用材料和直音材料来证明的,诸如异文中的同音借用字、同源通用字,以及声训、读如、读若等。韵部方面的一些主要结论,从顾炎武十部,到王力三十部(战国),俞敏三十二部等,也都用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假借、直音和读若等材料来作为辅助的证据。

内证为主的原则,要贯穿到语言比较、对音等研究方法中。如果我们想从与其他语言的比较中找出上古语音的状态,首先要把从上古文献材料中归纳、整理、验证过的语音系统描写出来,一切比较和构拟如果不能符合形音义全面的事实,就难以成为结论,甚至不能成为科学的假说。这就是“内证为主”的基本原则。内证为主,外证为辅,不仅仅是音韵学的原则,而且是一切科学研究必须遵从的最起码的原则。

内证为主,在亲属语言比较中,就是先要系联上古汉语内部的同源词,再系联所谓的亲属语言内部的同源词,然后对两方面的同源系列进行声音和词源意义的全面比较。仅仅从个体词的语音相似来确定同源,难免会产生附会,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例如:有人根据上古汉语与藏语的“米”声母都是唇音而断定它们是同源词,他们忽略了,汉语的“米”与“迷、谜、眯”等词同源,词源意义为“细小、隐”,而古代藏语的“米”与“结籽”相连,它们在各自的语言里属于不同的词族,也就有着不同的词源意义。把词汇意义的对译当成词源意义进行词源比较,难免会产生借词与同源词混淆的问题。再如:有人把汉语的“含”与藏语的“含食”比较,又把上古汉语的“念”与藏语的“思想”比较,也忽略了上古汉语“含、念”等是同源词,其共同的词源意义“隐于内”,不应当按照词汇意义分别进行比较。正是因为没有对上古汉语同源词进行系联而仅仅进行单个字的比较,很多比较带有随意性,同一个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遵循以内证为主,外证为辅的原则来进行亲属语言比较,应当先各自进行内部的系统研究,各自形成系统后,如果有可比性,再进行相互的比较。如前所说,章太炎在《成均图》里从音理上厘定了二十三部的关系,同时又有《文始》之作;王力先生

在前人古韵学的基础上,创建了科学的音系研究方法,同时又有《同源字典》之作。他们都首先在上古汉语语音与词汇的关系上下功夫,在上古汉语音系与同源系列互证的事实上下功夫。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里,有一个构拟出的“始源语”概念:

“始源语”又称母语、基础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用语,指一个语系中最古老、最原始的语言,作为这一语系各个成员的共同始源,其他语言都是由它繁衍出来的。例如,汉藏语系的始源语是原始汉藏语,印欧语系的始源语是原始印欧语。始源语已不复存在,它是运用历史比较法根据同一语系诸语言中已经证实的形式构拟出来的,所以只是一种假设的语言模式。<sup>①</sup>

如果我们将其他语言的语言形式认定为汉语虚拟的始源语,而放弃汉语内部由同族词系联得到的实际读音形式,这种方法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呢?坚持内证为主的原则,不是不可以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只是要把汉语自身的上古音形式当成主证,而把与其他语言比较得到的语音形式当成旁证。当二者发生差异时,要慎用虚拟的外证,避免把其他语言的状态强加给汉语。

利用现代方言上推古音时,要考虑方言的地域差异与古今差异经过数千年的历程,分化与融合共存,发展多途,演变多向;从音类上追溯语音演变扩散的层次不可简单化,验证古音的音值更需谨慎。

各地方音比通语更有存古性,由此,清代以来的古音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当时的方音来研究古音。除了传世文献中的方音材料,近现代被用来研究上古音的还有现代方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受西方语音学影响,一些学者拟测中古音韵母音值的主要根据不但有现代汉语各地区的方言,还有汉音、吴音、高丽音、安南音等。这些材料中的方音信息,可据以考古音,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材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古音音值,不同方音之间,哪一种方音的哪一种成分更接近古音的真实,这需要具有科学的语音历史演变的观点、具体材料具体分析的方法、综合比较各

<sup>①</sup> 戚雨村等:《语言百科词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第364页。

种材料的能力。

高本汉用现代方言材料构拟中古汉语语音,其《中国音韵学研究》第四卷《方言字汇》利用了26种方言,其中包括22种现代方言和“高丽”“汉音”“吴音”“安南”4种域外方言。他首先构拟了中古汉语的语音体系,又在此基础上利用《诗经》等古代韵文,构拟出上古音系统(三十五部,含独立的去声韵)。<sup>①</sup>高本汉的构拟,当时和后来的人都有不同意见。如,高本汉据高丽译音,认为四等有介音[i]。这个意见值得商榷。因为反切一、二、四等为一类,三等为一类(舌齿音二、三等为一类),四等与一等具有一致性,一等没有介音,四等也就不可能有[i]介音。又如,《广韵》有开合同韵和开合分韵的做法,高本汉根据现代的一些方言和蟹摄的安南译音,提出合口介音分两种:u和w。这遭到普遍的批评。因为《广韵》中开合分韵的,有的在《切韵》中本来并不分。陆志韦说:

二三四等的合口,高氏一概作w,惟独文韵系作u,而真韵系的w跟諄韵系的u居然并驾齐驱。那都是陋点。《切韵》并不分真諄(就说《广韵》吧,諄韵系也并非没收有开口字。两个合口可以强作分别,两个开口怎么办呢?)。<sup>②</sup>

诸如此类的意见还有很多。高本汉运用西方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汉语音韵,方法上是比较现代化的,而不少结论受到怀疑,其原因是汉语的方言之间的关系与印欧语系各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一样,前者要比后者复杂。从《切韵》到现代方言,是不是都有直接的对应?中间又有几个阶段?各阶段中孰与孰对应?从上古音到《切韵》,是不是直接的相承与对应?上古音是不是一个包含着方音和历时音变的复杂体系?再往前点说,上古音是不是一个理想的来源于同一母语的体系?这其中哪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可能影响到由现代方言上推上古音的结论。

对音的方法是要利用拼音的外语与汉语的对译材料,将外语已经分析了语音结构移植到汉语这种音节文字上来。这是研究上古音韵,特

<sup>①</sup> 高本汉著,聂鸿音译:《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第107~230页。

<sup>②</sup> 陆志韦:《古音说略》,《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1页。



别是分析每一个音节的内部结构的很好的办法。但是,运用这种方法,要考虑到音系不同,两种语言对译中具有不切合性,这种不切合性表现在:不同的语言之间,由于音系不同,此语言中的某些音,在彼语言中没有相同的音来对应,只能用相近的音去代表。如,梵文与汉语的对音就不是十分精确。周法高说:

我们知道:早期的梵文译音,除了用知、彻、澄母对译梵文的  $t$ ,  $th$ ,  $d$ ,  $dh$  外,还可以用来母字对译它们。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梵文的  $t$  等,相当于国际音标的  $[t]$  等,在汉语里没有这一类的音,于是除了借用知系字外,有时还借用来母字。<sup>①</sup>

又如,俞敏先生在进行梵汉对音后发现“汉末的汉话没有  $c$  组塞擦音”,证据是当时对译  $c$  组的汉字杂乱。如,对译  $c$  的有照组的“周、舟、旃、招、遮、瞻、震、支、真”,还有“坻”(定)、“作、笛”(精)、“沙”(心)、“懿”(影)、“檐、阎”(喻)。<sup>②</sup> 即,汉末对译梵语的  $c$  的字,除了照三,还有定纽、精纽、心纽、影纽和喻纽的字。这说明两种语言的音系不同,一些音的对译无法完全准确,只能是相近的。如果没有内证为主的原则,这些例外的情况发现不了,结论就容易错误。

### 三、充分估计汉语内证材料的泛时和异域特点

内证材料这样重要,我们为什么还要采用其他方法和证据来补充呢?这是因为,语言的系统应当具有共时性,因此描写音系应当选择共时材料来进行。但是,汉语的书面文献材料很难完全共时和共域,往往有泛时和异域的材料介入其间。

上古音研究必然涉及“上古”时间外延的问题。传统古音学的“上古”指先秦两汉,我们遵从前人的主张。对于古音史,王力先生先后有“三点一线式”和“九点一线式”的框架。“三点”即先秦两汉为上古,魏晋南北朝

① 周法高:《梵文  $t$ 、 $d$  的对音》,《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册,1949。

②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2页。